

关于《给胡适之先生一封公开信》

邓瑞金

在1948年底的政权交替之际，北平知识界面临选择。是留下来迎接新政权，还是收拾书篋南下，去寻找另外的出路。那些具有较大影响的学者们的去留，倍受人们关注。胡适走了，陈垣留下来了。1949年5月11日，陈垣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给胡适之先生一封公开信》，这位一向不问政治的史学大师却突然谈起了政治，向世人发表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看法，阐述自己留下来的理由。5月17日，《进步日报》转载了这封《公开信》，在海内外知识界引起巨大震动。

胡适当时任北京大学校长，其影响和地位自不待言。而陈垣则自1926年起一直担任辅仁大学校长，后又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是公认的史学大师。三十年代前后的史学界有“南陈北陈”之说，“南陈”为修水陈寅恪先生，“北陈”就是新会陈垣先生。陈垣于1912年以“革命报人”的身份出任众议院议员，次年（1913年）赴京议政，并从此在北京定居，故此被称为“北陈”。由此也可以看出陈垣的地位和影响。北平被围，天津不保，胜负昭然，南京国民政府计划将一批文化界名人和大学校长接运到南方，其中就有陈垣，而且被列入重点名单。走还是不走，不仅关乎个人日后的命运，而且浓缩了一个学者几十年来对学术与政治的认识和感悟。兵临城下，必须迅速作出抉择，历史只给了一个月的时间。

为劝说陈垣离平南下，国民党青年部长陈雪屏受教育部委托，亲自登门拜访，但没有得到明确答复。陈雪屏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和陈垣先生颇有交往，他见陈垣似无南下之意，就请胡适和郑天挺帮忙做工作。胡适佩服陈垣的学问和为人，他也非常希望陈垣能够南下，为此专门派北大秘书余逊先生去向陈垣介绍北平面临的危险局势，并转达教育部和他个人的关心。余逊是辅仁大学国文系主任余嘉锡先生的儿子，也是陈垣的学生。同当时的许多学人一样，陈垣先生不想走，因为他对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政府的表现非常失望，这位经历满清、袁世凯、北洋军阀和国民政府的老人要亲眼看看共产党政权是个什么样子。

胡适在离开北平前的12月13日晚上，给陈垣先生写了一封信，信的主要内容是关于《水经注》的考证。在这一时期，胡适对《水经注》发生了浓厚兴趣，先后搜集《水经注》的版本达9类40余种，其中关于杨守敬《水经注疏》的版本时代问题和陈垣的意见不一致。陈垣于12月7日给胡适的信里谈了对这一问题的看法，12月13日胡适复函，云：“这几天，天天想写信给先生，总不得暇，故十二月七日的信到今天还没有奉答。北大五十周年，承允惠临讲演，不胜感谢。……今夜写此短信，中间被电话打断六次之多，将来不知何时再有从容治学的福气了。”（《陈垣来往书信集》第19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1948年12月15日，也就是在写完此信30个小时之后，胡适赶往北平南苑机场登机，在这架专门接运北平学者的飞机上还有清华大学教授陈寅恪先生。

胡适和陈垣一向关系较好。胡适长期在北大任教，而陈垣1922年被聘任为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导师，1930年成为北大名誉教授，是经常在北大兼课的教师之一，他的得意之作《元西域人华化考》及《二十史朔闰表》、《中西回史日历》等都是在北大出版的，两人可以说是同事。据说有一次在北大的教师休息室，陈垣、

胡适等教授均在座，一位北大学生拿着自己写的一部《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请胡适题签，陈垣打趣说：“这真是请宋江来题《水浒传》了。”可见二人关系是很融洽的。由于两人在一段时期研究的领域很接近，经常互相切磋，但两人的意见往往发生分歧，如关于《四十二章经》、《牟子理惑论》及本文提到的《水经注疏》等。虽然学术上有分歧，但并不影响他们的友谊。陈垣三十年代的力作《元典章校补释例》（后改称《校勘学释例》）完成后，请胡适作序，胡适以《校勘学方法论》为题写了一篇长序，称之为“中国校勘学的一部最重要的方法论”，“中国校勘学第一次走上科学的路”，“新的中国校勘学的最大成功”，评价极高，以致有人认为有奉承之嫌。此外，被陈垣称为“自己学识的里程碑”的《通鉴胡注表微》，是他学术生涯的最后一部专著，也拟请胡适作一后序，由于时局急转直下，胡适匆匆离开北平，一切都无从谈起了。胡适对陈垣很尊重，遇到有关古籍版本及历史年代方面的疑难问题，经常征求陈垣的意见，并请陈垣到北大授课讲演。在1948年底，解放军已经兵临城下时，胡适正在筹备北大50周年校庆，他特意邀请陈垣先生去演讲助兴，这在本文前面所引胡适给陈垣先生的信中也有提及。

面对波谲云诡的时局，那些一向不问政治、沉湎于学术王国的学者也会感到忐忑不安，胡适和陈垣在讨论《水经注》的同时，也谈论对时局和未来的看法。胡适曾对陈垣说：“共产党来了，决无自由。”并且举出克兰钦可《我选择自由》一书中的有关论述作为证明。陈垣没有留过洋，但他是一个注重实证和严密考据的史学大师，没有足够的证据是从不下结论的，因此他对胡适的话表示怀疑。另外，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他是看在眼里的。抗战胜利后，沦陷区的人民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政府和军队，但那些接收大员们不仅借机贪污敛财，而且以胜利者自居，趾高气扬，看不起长期遭受日寇铁蹄蹂躏的沦陷区人民。陈诚到达北平不久，在一

次文化教育界的集会上说：“抗战八年，北平的知识分子颓废了。”陈垣当时就拍案而起，指着陈诚说：“我们怎么颓废了？你怎么知道我们颓废了？你知道这八年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说完，拂袖而去。对共产党陈垣了解不多，对国民党陈垣很了解，至少他自己认为是这样，他认为不可能有比国民党更腐败的政权了，这是他不接受胡适劝说的的主要原因。

在胡适等第一批学者南下之后，南苑机场即被解放军封锁，后来接运学者的飞机只能降落在北平东单临时机场。12月21日，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率第二批学者登上了飞往南京的飞机，同行的有袁同礼、李书华、江文锦等，陈垣还是没有走。南京方面非常希望陈垣能够南下，因为他们知道陈垣在学界的巨大影响，陈垣不走，他们感到没有面子，劝说工作仍在继续。第三批，也就是最后一批，定于1949年1月8日起程，飞机仍然停在东单临时飞机场。这时，陈垣学生中的进步青年开始做陈垣的思想工作，他们向陈垣介绍共产党的政策，介绍解放区的情况，希望陈垣能够留在北平，以影响处在犹豫之中的其他学者。1月4日，余逊再一次劝说陈垣，明确告诉他这是最后一次机会，教育部恳切希望他南下，要他做好准备，1月8日早上有专车接他去飞机场。陈垣对此不置可否。1月8日这天，陈垣演了一出“空城计”，他很早就离开家，来到西单王爷佛堂胡同甲一号，这是他的学生刘乃和先生的家。陈垣是刘府的常客，以前每次去多是书写字幅，谈论学问，而这次主要谈论时局，一直到晚饭过后才离开。虽然南京方面没有接到人，但新闻稿早已写好，次日北平、南京等地的报纸援引中央社消息：“陈垣等人昨日离平飞京。”

1月22日，傅作义将军接受和平改编，1月31日，解放军进入北平城。随后，开始了对文化教育界的接管工作。

虽然陈垣留在了北平，明确表示要同共产党合作，但从延安及其他一些解放区回来的进步知识分子，认为陈垣是典型的旧式

学人，思想落后，和胡适关系不清，而他任校长的辅仁大学又是教会学校，有帝国主义背景，因此对陈垣颇有微词。陈垣有不少朋友和学生很早就投奔了共产党，他们把这一情况告诉了陈垣，并劝说陈垣应立即有所表示。经过讨论，陈垣同意用给胡适回信（即回复胡适1948年12月13日的来信）的方式写一封公开信，在报纸上发表，借此表示同共产党合作、同国民党决裂的态度。参加讨论的除陈垣外，还有他的得意弟子柴德赓先生、刘乃和先生和刘乃崇先生，最后由刘乃和先生执笔完成，日期为1949年4月29日。

《公开信》写完后，首先送给范文澜先生提意见，可以说范文澜是这封公开信的第一个读者。为什么要给范文澜看呢？因为当时的学术界，范文澜是仅次于郭沫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中共党内有一定影响。此外，陈垣和范文澜有一段特殊的交情。1931年，范文澜在北平一度没有工作，生活很窘迫，后经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黄节介绍，陈垣聘请范文澜到辅仁大学史学系任教，讲授“正史概论”。1934年，范文澜因为思想激进，有“共党嫌疑”，被当局逮捕囚禁。陈垣为营救范文澜，多次去警察局和宪兵队找人说项。当局鉴于陈垣的地位和声望，又要陈垣亲自写下保证书，才同意放人。范文澜出狱后不久，先去河南大学任教，1940年去了延安。范文澜很感谢陈垣，从延安回到北平后，第一个看望的就是陈垣。范文澜看过《公开信》后，认为写得很好，很有现实意义，就亲自送到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经过审查，于5月11日全文刊出，《进步日报》于5月17日转载，香港《华商报》于5月29日转载。海内外学人对这封公开信反映极为强烈，认为像陈垣这样的旧式史学大师都愿意跟共产党走，说明共产党及其政策并不像宣传的那样可怕。

胡适对这封《公开信》是什么态度呢？他在《自由中国》上发表文章，根本不相信这是陈垣的手笔，认为是共产党胁迫结果，

其理由之一就是陈垣从不用白话文写作，而这篇声情并茂的作品显然是别人代笔。应该说胡适的分析是有道理的，陈垣一生的著述都是用清晰简洁的浅易文言写成的，确实不曾使用过白话文。

这封《公开信》出自刘乃和先生的手笔。刘乃和先生是陈垣的得意弟子之一，从1939年考入辅仁大学史学系开始，一直到1971年陈垣逝世，在陈垣身边学习、工作达32年，在学术、行政和生活等许多方面为陈垣做了大量工作。1947年，刘乃和先生从辅仁大学史学研究所毕业后，即留校任教，1952年，辅仁大学同北京师范大学合并，陈垣出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刘乃和先生成为他的助手和专职秘书。三、四十年代的青年学生大多喜欢巴金的作品，刘乃和先生也不例外，这封《公开信》就很有巴金的文风。如第二段：“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南京政府三番两次的用飞机来接，我想虽然你和寅恪先生已经走了，但是青年的学生们却用行动告诉了我，他们在等待着光明，他们在迎接着新的社会，我知道新生力量已经成长，正摧毁着旧的社会制度。我没有理由离开北平，我要留下来和青年们一起看看这新的社会究竟是怎样的。”再如第四段：“你说‘决无自由’吗？我现在亲眼看到人民在自由的生活着，青年学生们自由的学习着、讨论着，教授们自由的研究着。”这些新鲜、生动又时髦的句子句式确是不可能出自陈垣之手，但所表达的意思应该说是陈垣的想法。《给胡适之先生一封公开信》是刘乃和先生第一次为陈垣代笔，此后，她成为陈垣的助手和专职秘书，陈垣的讲话稿、文章以及书信等几乎都由她起草。

在无尽的历史长河中，任何人都是渺小的，任何事件都是微不足道的，但活着的人决不能丧失伟大的精神和深刻的反思。五十年过去了，当年引起巨大轰动的《给胡适之先生一封公开信》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记忆，其中涉及到的人物都已经先后作古。胡适于1962年客死海外，陈寅恪于1969年在广州病逝，陈垣于

1971 年在北京逝世，三位学术巨匠连同他们开创的学术时代都成为了历史长河中的水滴，伟大与崇高，可笑与可悲，他们是不在乎后人怎样评说的。

刘乃和先生的名字是和陈垣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她对学术和理想的执着追求，对工作和事业的默默奉献，一向得到学术界的赞誉。她一生撰写了近二百篇文章，但她最为看重的是《给胡适之先生一封公开信》，她认为这篇文章无论对她还是对陈垣都非常重要，她希望人们能够充分认识这篇文章的时代价值。1998 年 5 月 16 日，刘乃和先生在走完了八十年的人生岁月之后溘然长逝，启功先生挽联云：“令誉流传，统战辛勤人共仰；长眠论定，平生业绩自无私。”诚知人之论。

谨以此文悼念恩师刘乃和先生。

胡适致陈垣函（1948 年 12 月 13 日）

援庵先生：

这几天，天天想写信给先生，总不得闲暇，故十二月七日的信到今天还没有奉答，千万请恕罪。北大五十周年，承允惠临讲演，不胜感谢！

先生依据梁节庵与叶浩吾两人在武昌的时代，修改我的结论，断定杨惺吾两札作于光绪廿三年丁酉（一八九七）四月，当时还没有《水经注疏》的著作。此事劳先生费不少日力，不胜感激！

先生这个修正，我特别感觉兴趣。但今天翻查《邻苏老人年谱》，发见了一点反证，似还需再斟酌。《年谱》说：“乙未（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五十七岁。……是年七月因长女……欲归，遂送之上省乘轮船。及至省，船未到，忽闻母病亟，又携女返黄。及至，则母柩停堂中矣。哀哉！八月，以母柩厝堂左，即赴宜都本籍卜地。……”据此则惺吾于乙未七月丧母，至丁酉四月，尚在母丧之中，因此两札均仅署名“守敬”，均不似居母丧的情形。故我颇疑梁、叶两家所记。浩吾自纪癸巳至丁酉均在武昌，是可依据的；而梁氏家乘所谓“壬辰至丙申节庵在焦山及南京”，则似仅记行踪大概，未必可以

完全信赖（如董秉纯所作《谢山年谱》，其所记谢山行踪多不完备，不可用作考据）。惺吾自记丙申年九月曾“致书梁星海，恳求张文襄以小轮拖柩赴宜都，文襄允之。”不知此札亦在尊藏否？如此札尚存，不知其署名作何式？以上所陈，均乞先生切实指正。匆匆，敬祝大安。胡适敬上。卅七，十二，古三夜。

今夜写此短信，中间被电话打断六次之多，将来不知何时才有从容治学的福气了。

给胡适之先生一封公开信

陈 垣

适之先生：

去年十二月十三夜得到你临行前的一封信，讨论杨惺吾邻苏老人年谱中的问题，信末说：“今夜写此短信，中间被电话打断六次之多，将来不知何时才有从容治学的福气了。”当我接到这信时，围城已很紧张，看报上说你已经乘飞机南下了。真使我觉得无限怅惘。

记得去年我们曾谈过几回，关于北平的将来，中国的将来，你曾对我说：“共产党来了，决无自由。”并且举克兰钦可的《我选择自由》一书为例。我不懂哲学，不懂英文，凡是关于这两方面的东西，我都请教你。我以为你比我看得远，比我看得多，你这样对我说，必定有事实的根据，所以这个错误的思想，曾在我脑里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我也曾亲眼看见大批的青年都已走到解放区，又有多少青年，正在走向这条道路的时候，我想难道这许多青年——酷爱自由的青年们都不知道那里是“决无自由”的吗？况且又有好些旧朋友也在那里，于是你的话在我脑里开始起了疑问，我当时只觉得这问题有应该研究的必要。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南京政府三番两次的用飞机来接，我想虽然你和寅恪先生已经走了，但是青年的学生们却用行动告诉了我，他们在等待着光明，他们在迎接着新的社会，我知道新生力量已经成长，正在摧毁着旧的社会制度。我没有理由离开北平，我要留下来和青年们一起看看这新的社会究竟是怎样的。

当北平和南京的报纸上刊载着我南飞抵京的消息，这就看出南京政府是要用我们来替他们捧场的，那对于我们有什么好处呢？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

完全明白了，我留在北平完全是正确的。

今年一月底，北平解放了。解放后的北平，来了新的军队，那是人民的军队，树立了新的政权，那是人民的政权，来了新的一切，一切都是属于人民的。我活了七十岁的年纪，现在才看到了真正人民的社会，在历史上，从不曾有过的新的社会。经过了现实的教育，让我也接受了新的思想，我以前一直不曾知道过。你说“决无自由”吗？我现在亲眼看到人民在自由的生活着，青年学生们自由的学习着、讨论着，教授们自由的研究着。要肯定的说，只有在这解放区里才有真正的自由。以往我一直是受着蒙蔽，适之先生，是不是你也在蒙蔽着我呢？

在这样的新社会里生活，怎么能不读新书，不研究新的思想方法。我最近就看了很多很多新书，这些书都是我从前一直没法看到的，可惜都是新五号字，看来太费力，不过我也得到一些新的知识。我读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认清了现在中国革命的性质，认清了现在的时代。读了《论联合政府》，我才晓得共产党八年抗日战争的功劳，这些功劳都是国民党政府所一笔抹煞的。读了《毛泽东选集》内其他的文章，我更深切的了解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从而了解到许多重要的东西，像土地改革的必要性，和我们知识份子的旧的错误的道路。读了史诺的《西行漫记》，我才看到了老解放区十几年前就有了良好的政治，我们那时是一些也不知道的。我深深的受了感动，我深恨反动政府文化封锁得这样严紧，使我们不能早看见这类的书。如果能早看见，我绝不会这样的渡过我最近十几年的生活。我爱这本书，爱不释手，不但内容真实、丰富，而且笔调动人，以文章价值来说，比《水浒传》高得多，我想你一定不会不注意的。况且史诺作这书的时候是一九三六年，那时你正在美国，难道你真没有看见过吗？读了萧军批评，我认清了我们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容易犯的毛病，而且在不断的研究，不断的改正。我也初步研究了辩证法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使我对历史有了新的见解，确定了今后治学的方法。

说到治学方法，我们的治学方法，本来很相近，研究的材料也很多有关系，所以我们时常一起研讨，你并且肯定了我们的旧治学方向和方法。但因为不与外面新社会接触，就很容易脱不开那反人民的立场。如今我不能再让这样一个违反时代的思想所限制。这些旧的“科学的”治学的方法，在立场上是有着他基本错误的，所以我们的方法，只是“实证主义的”。研究历史和

其他一切社会科学相同，应该有“认识社会，改造社会”两重任务。我们的研究，只是完成了任务的一部份，既有觉悟后，应即扭转方向，努力为人民大众服务，不为反人民的统治阶级帮闲。

说到实证，我又该向你说一个我的想法。最近有一天，我去过你住的东厂胡同房子里，现在有别的朋友住着。我和朋友谈天的时候，记忆清楚地告诉我，这屋子从前是怎样的陈设，旧主人是怎样的研究《水经注》。你搜罗《水经注》的版本到九类四十种之多，真是尽善尽美了。可是我很奇怪，你对政治的报告，何以只看蒋介石那一本，不注意毛泽东那一本呢？你是和我的从前一样，真不知道吗？我现在明白了毛泽东的政治主张和实际情况，我愿贡献你这种版本，校正你孤证偏见的危险。

我一直不同意你在政治上的活动，但是我先前并不知道你在服务于反动统治政权，我只是以为学术与政治是可以分开来看的。这种错误的看法，直到最近才被清除。我才知道了“一切文化服从于政治，而又指导了政治”。

你在政治上的努力，直到今日，并未减少。昨天北平《人民日报》载你二十二日在旧金山发表一段说话，说：“中国政府如证明其力能抵抗共产主义，则不待求而美援必自至”，又说“政府仍有良好之海军与强大之空军，如使用得宜，将为阻止共产党进入华南之有力依恃。”你还在做着美国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国民党反动统治政权的桥梁，你还有如此奇特的谈论，这使我不禁惊异，难道你真不知道借来的美援和那少数反人民的统治集团的力量可以抵得过人民的武装吗？难道你真看不出中国应走的道路吗？现在和平的谈判，被蒋介石他们拒绝了。战争的责任从来就该他们担负，他们还应该负下去。南京已经解放了，全国解放，为期不远。如果分析一下，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在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已经团结起来的今日，任何反人民的武力也要消灭的。

在三十年前你是青年的导师，你在这是非分明，胜败昭然的时候，竟脱离了青年而加入反人民的集团，你为什么不再回到新青年的行列中来呢？

我以为你不应当再坚持以前的错误成见，应当有敢于否定过去观点错误的勇气。你应该转向人民，要有为人民服务的热情。无论你是崇拜美帝也好，效忠国民党也好，是为个人的知恩感遇也好，但总应该明白这是违反人民大众的意思，去支持少数祸国殃民的罪魁。

我现在很挚诚的告诉你，你应该正视现实，你应该转向人民，翻然觉悟，

真心真意的向青年们学习，重新用真正的科学的方法来分析、批判你过去所有的学识，拿来为广大的人民服务。再见吧！希望我们将来能在一条路上相见。陈垣。一九四九，四，廿九。

（原刊《人民日报》1949年5月11日）

（上接 111 页）

存二十一卷、十七至十九、三十至三十一、三十六至三十八、四十六至四十七、四十九至五十八、六十。

而实际所存卷数如下：

卷十五至十九、三十至三十一、三十六至三十八、四十六至四十七、四十九至六十。

凡二十四卷。

对比之下可见，查阅目录与胶卷卷首目录皆漏列了卷十五至十六、五十九。共少列三卷。（但在十九卷后劳健的跋文之下，列有五十九卷）卷十五与卷十六所存内容的确很少，但毕竟存在，所以查阅目录与胶卷卷首目录应将所漏三卷补列。

• 徐之明 •